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引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董雪兵

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阶段性新特征和区域演进新规律，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高度谋划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许多重要论述都收入《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比如，《新形势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思路和举措》指出：“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指出：“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and 国土空间体系”；等等。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蕴含丰富的原创性贡献，不仅深刻回答了“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怎么看”的认识论问题，更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怎么办”的实践论问题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提出“优化区域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并作出战略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引，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and 国土空间体系，谱写区域协调发展新篇章。

把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提升到治国理政的高度进行战略擘画

习近平总书记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新时代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变化，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在空间维度的集中反映，创造性地将区域协调发展作为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抓手，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略实施，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行，一以贯之推进实施东部率先发展、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战略，引领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

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通过区域协调发展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是习近平经济思想最重要、最主要的内容，协调发展是新发展理念这一有机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协调发展作为协调发展理念在国土空间维度的集中体现，其成效直接关乎新发展理念能否真正落地、发展质量能否达标，并与其他四大发展理念内在贯通、相互支撑。缺乏区域之间的有效协调，创新要素就难以实现跨区域的优化配置，绿色转型就难以形成跨区域的生态屏障与协同治理，高水平对外开放所要求的全国统一大市场

就难以稳固，发展成果也难以真正惠及所有区域和全体人民。因此，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不仅是践行协调发展理念的直接体现，更是使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在广袤国土空间系统展开、协同推进的空间前提与运行基础。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和空间治理复杂性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锚定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需求，通过区域协调发展优化经济空间布局、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在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必然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指出：“各地区要找准自己在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位置和比较优势，把构建新发展格局同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等有机衔接起来”；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把未来发展空间主动权》中指出：“各地区要自我循环，打消区域壁垒，真正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要求打破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堵点。当前，区域壁垒和市场分割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障碍。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提出，破除地方保护和地方保护、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等。区域协调发展能够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组织基础和运行保障。推动实现更高层次的区域协调发展，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等方面的隐性壁垒，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能够有效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提升国民经济体系的整体效能、循环效率和韧性水平。将区域协调发展置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位置，标志着其战略功能从过去相对侧重于局部地区融入经济循环转向更加注重服务国家经济整体运行和培育发展内生动力，是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石。

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个主题，通过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发展方式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区域协调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一个国家整体的高质量发展，必然要求各区域发展水平和质量普遍提升。任何区域在发展中存在的“短板”，如发展方式粗放、创新能力滞后、生态环境脆弱等，都会制约国家发展整体质量的提高。同时，高质量发展并非整齐划一的发展，而是要鼓励不同区域因地制宜、走出特色化发展路径。比如，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正是在高质量发展这个主题下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路径的有力实践。当前，我们正在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着力点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通过优化空间资源配置、引导各地依据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能够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促进区域创新链产业链高效协作，进而提升国家发展整体质量、结构韧性与可持续性。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个主题，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中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将推动

区域发展进入更加注重内涵式提升的新阶段。

紧扣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通过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发展成果共享、扎实迈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最终都要落脚到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并重。一方面，要支持经济大省挑大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作示范，发挥其作为高质量发展动力源的作用；另一方面，要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等的差异化政策支持力度。应当认识到，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并非简单促进区域之间在经济上平衡发展，而是注重构建更为公平合理的区域发展秩序。通过促进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健全区域间利益补偿和帮扶机制、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等，为不同区域、不同群体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奠定坚实基础。将区域协调发展确立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逐步消灭区域差别思想的创新性实践探索，深刻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集中彰显了我们党致力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团结带领全体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坚定决心。

深刻揭示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规律

“十四五”时期，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下，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纵深推进，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三大经济引擎持续发力，四大板块发展均衡性稳步增强，海洋经济发展水平明显提升。从数据看，2020—2024年，东部与西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之比从1.68:1下降到1.65:1。从态势看，中西部地区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近年来稳定在四成以上，经济增速快于全国平均水平；随着高质量发展共建“一带一路”深入推进，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正从昔日的开放末梢走向前沿，展现出强劲的开放活力。各地区找准定位、各展所长，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力。

我国区域协调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历史性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牢牢把握了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规律。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指出：“协调是发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由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在《新形势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思路和举措》中指出：“不平衡是普遍的，要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这是区域协调发展的辩证法”。习近平总书记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聚焦新时代区域发展中的突出矛盾，系统阐释并科学统筹人与自然、效率与公平、整体与局部、扬长与补短等一系列关乎区域协调发展全局的重要关系，深刻揭示了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规律。

科学统筹人与自然的关系，明确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实践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在《对新常态怎么看，新

常态怎么看》中指出：“既要促进地区间经济和人口均衡，缩小地区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差距，也要促进地区间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缩小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间的差距。”传统上，衡量区域之间的发展是否协调平衡，往往关注经济总量或人均经济指标。但应看到，区域并非孤立的单元，而是人、经济活动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生命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将区域协调发展从单一经济维度提升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超越了以往“人类中心主义”或“重开发、轻保护”的片面发展观，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把资源环境承载力作为前提和基础。同时，坚持陆海统筹，将海洋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区域协调发展，既要依据主体功能区战略，构建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空间格局，也要拓展蓝色经济空间，加强海岸带综合管理和海洋生态保护，推动陆海资源要素顺畅流动，构建陆海协调、人海和谐的区域发展新格局。

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注重在动态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如何辩证看待和正确处理区域发展不平衡产生的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矛盾，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一个重点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指出：“强调协调发展不是搞平均主义，而是更注重发展机会公平、更注重资源配置均衡。”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处理区域发展差距问题提供了科学指引，要求动态地、发展地、联系地看待区域发展差距，在尊重规律的基础上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一方面，承认并利用“不平衡”所蕴含的发展动能，支持经济大省挑大梁，允许和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发挥比较优势率先发展，形成辐射带动全局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和动力源；另一方面，通过国家宏观调控和制度安排，如财政转移支付、对口帮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积极主动调节“不平衡”，保障欠发达地区的基本民生和发展机会，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稳步迈向共同富裕。这种既正视差距、激发活力，又主动调控、促进公平的辩证思维和政策导向，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处理好效率与公平关系这一重大课题的深刻解答和理论升华。

正确处理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坚持全国一盘棋，要求处理好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进一步深化了对坚持全国一盘棋的认识，将拓展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纵深。坚持全国一盘棋，既要求在顶层设计和战略实施中充分尊重区域发展的客观差异性和地方实践的创造性，也要求各地区将自身发展置于国家发展大局中考量和定位。在实践中，构建多层次、立体化的区域联动新格局，发挥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的基础支撑作用，强化不同区域之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拉近不同区域的时空距离；发挥

重点城市群的载体依托作用，推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城市群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支持处于战略交汇地带的跨区域联结型地区打破行政壁垒，发挥枢纽节点作用，探索“飞地经济”等新模式。通过正确处理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加强区域联动，将全国一盘棋走活、走实。

把握扬长与补短方法论，推动优势区域和短板区域协同并进。我国各区域资源禀赋千差万别，发展基础不尽相同，功能定位各有侧重，优势长板与短板弱项并存是基本国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地区要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扬长补短，走出适合本地区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扬长”就是要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让资源禀赋好、创新能力强、区位优势明显的地区能够率先突破、做优做强，加快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和动力源；“补短”就是要清醒认识并着力克服发展中的薄弱环节，持续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生态脆弱地区等特殊类型区域的支持力度。特别是要扎实推进边境城镇建设，将其作为关乎国家安全与民生福祉的关键“短板”来补齐补强，坚持兴边富民和稳边固边相结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国家安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要求摒弃“一刀切”的做法，实施差异化、精准化的区域政策，促进各地区因地制宜走出符合本地区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以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区域协调发展实践行稳致远

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和复杂的系统工程。在看到新时代以来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存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还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比如，不同地区的自然资源禀赋、经济发展基础等存在较大差异，经济增速不可能“齐步走”；不同地区在国家发展全局中承担的功能定位不同，不能单一以经济指标作为标准；等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作出重要部署，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出进一步重要部署，既有对已部署改革任务的延续、深化、具体化，也有根据新形势新要求提出的新的任务举措。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引，围绕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and 国土空间体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塑造我国区域发展新格局新优势。

有序促进区域联动发展。新时代新征程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坚持和加强党中央对区域协调发展的集中统一领导，完善、准确、全面贯彻我们党在新形势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总的思路，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叠加效应，促进区域联动发展。在实践中，要加大实施力度，既推动各战略深度融合、功能互补，又坚决克服战略执行碎片化倾向。同时，发挥跨区域联结型地区的支撑带动作用，

深化跨行政区合作，拓展流域经济模式；强化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确保党中央战略意图精准传导，有效落地，真正做到观全局、谋长远、布大局，使国家战略的整体效能得到最大程度发挥，形成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强大合力。

在动态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立足我国区域发展实际，牢牢把握辩证思维方法，引导各地依据自身的主体功能定位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走差异化、特色化、集约化发展之路，才能不断提高区域协调发展质量。为此，要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促进区域创新链产业链高效协作，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实践中，坚持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支持具备条件的优势地区增强创新策源能力和辐射带动功能，建设大湾区（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加大差异化政策支持力度，通过更加精准有效的财政转移支付、区域帮扶、产业协作等方式，促进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等振兴发展。同时，推动产业结构、人口分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动态匹配，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贯穿于区域发展全过程。

促进要素自由流动高效配置，为区域协调发展注入持久动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空间一体化的重要手段，是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有力支撑。促进要素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既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畅通国内大循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内在要求。在实践中，要完善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等制度，坚决破除阻碍劳动、资本、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公平竞争、高效配置的各种显性与隐性壁垒，消除市场分割；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促进先进生产要素向效率更高、回报更优的区域和产业顺畅流动，优化组合，从而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提升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同时，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建设富有活力的创新型城市，增强部分超大城市对全球高端生产要素的配置能力。

持续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坚实长效保障。面向未来，要将制度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体制机制保障。为此，要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财税、考核制度，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优化企业总部和分支机构、生产地和消费地利益分享，健全区域间规划统筹、产业协作、利益共享等机制；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深化土地制度改革，赋予省级政府统筹建设用地更大自主权；完善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因地制宜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特别是完善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把保护者受益、使用者付费落到实处；等等。通过体制机制的不断健全完善与协同配套，确保区域协调发展在法治化、规范化轨道上不断迈向更高水平，谱写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新篇章。

（据《人民日报》作者为浙江大学国家战略与区域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如何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服务型制造

●黄庆华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迭代升级和应用拓展，产业融合发展不断深化，服务型制造已成为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方向。2025年，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印发《深入推动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实施方案（2025—2028年）》，明确提出有力促进制造业优化资源配置、拓展发展新空间、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为建成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服务型制造体系奠定坚实基础。“十五五”规划建议亦强调，促进制造业数智化转型，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那么，何为服务型制造？又如何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服务型制造？

服务型制造是指通过增加企业生产经营中服务要素的比重，促使企业的主要经营模式从生产、销售产品转向提供“产品+服务”。它区别于以“产品”为核心的生产型制造，强调将服务环节向研发设计、生产过程和运营维护等全链条延伸，实现制造与服务深度融合。当前，

全球制造业的竞争已演变为价值链和生态系统的整体竞争，服务型制造正是其中的关键抓手。对我国而言，所要发展的服务型制造既具备普遍特征，也立足本土资源和优势形成自身特色。与一般模式相比，中国的服务型制造更注重与产业生命周期方向紧密衔接，强调更多发挥国家战略引领、超大规模市场与数字技术的协同效应。其特色可能更多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依托超大规模市场所孕育的多层次需求和全产业链应用场景，推动制造业企业开辟差异化赛道，实现向价值链高端的集群式攀升；另一方面，强化数字赋能，以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为主线，通过提升产品可靠性、生产运营效率和产业链协同水平，系统性重塑制造业竞争力。

综合来看，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服务型制造，也意味着要发展具有世界水平的高端服务型制造。这既是将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优势转化为可持续竞争力的关键路径，也是应对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现实挑战的迫切需要。

我国已具备依托服务型制造推进制造强国建设的现实基础。在完整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的双重支撑下，中国制造既具备将单一产品供给升级为提供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系统解决方案的能力，又能在海量而丰富的应用场景中实现快速迭代、形成行业标准 and 品质化服务，反向牵引产品升级，有效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国际竞争力。

服务型制造技术正成为巩固我国制造业领先地位的关键支撑。在高端装备、新能源、智能制造等领域，我国服务型制造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通过把服务型制造的技术优势嵌入产品使用端和全生命周期，能够打造从数据采集到产品持续迭代的产业链闭环，不仅可以提升客户黏性和运营效率，还能有效实现从产品交付到价值共创的持续溢价。

发展服务型制造有助于以内涵式增长突破资源环境约束。在资源环境约束日趋紧张的情况下，传统“拼产能、拼成本”的增长方式难以维系。服务型制造可把价值创造从一次性销售延伸到产品的全生命周期，通过交付、运维、升级、再制造等环节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客户黏性，推动企业从价格竞争转向质量、品牌 and 解决交付方案竞争，在有限资源条件下实现内涵式增长。服务型制造强调促进产业生态协同发展。依托平台化服务和标准化接口，我国的服务型制造发展坚持向产业链上下游开放研发、制造和运维能力，带动上下游协同创新和专业化分工。这不仅使广大中小企业能够共享先进制造的发展成果、深度融入产业网络，而且从整体上增强了产业链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建设制造强国离不开发展特色鲜明的服务型制造，这并非几个服务制造环节的简单叠加，而要遵循以需求牵引方向、以技术提升效率、以体系支撑发展、以制度降低摩擦的产业演进逻辑，切实发挥服务型

制造的支撑作用。近年来，我国服务型制造发展持续加快，但仍存在发展短板，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促进其高质量发展。

一是构建全链条数字服务体系，筑牢数字服务底座。依托我国完备的工业体系基础，加快建成覆盖研发、生产、运维等全链条各环节的数字服务体系，提升企业柔性制造和敏捷响应能力，更好满足市场规模化定制需求。重点要强化技术赋能，把数智技术作为服务型制造的发展底座，加强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按需布局算力基础设施，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服务型制造深度融合。

二是培育壮大重点服务型制造产业，夯实服务能力根基。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态势良好，细分领域持续拓展，已形成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产业生态。需聚焦重点领域，推动制造和服务在技术、业态、模式上深度融合，以专业化分工提升效率，以创新驱动破解转型瓶颈，构建适配产业基础、兼具效率和韧性的服务型制造体系。

三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更好推动产业融合。在这一过程中，既要通过统一规则、畅通要素流动，破除制造与服务、线上与线下、区域之间的壁垒，推动服务型制造模式跨区域、跨场景复制推广，又要强化公平竞争，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促进数据、人才、资本等要素在全国范围内高效配置，从而全方位降低产业融合的协同成本，形成有利于服务型制造规模化发展的制度环境。

四是强化企业主体地位，激发市场内生动力。我国拥有数量庞大、覆盖全产业链的制造企业群体，应充分发挥其贴近市场、熟悉行业的优势，鼓励企业基于自身条件和内在禀赋以及发展阶段，主动探索服务化转型路径，增强对产业链的渗透力和对市场需求的响应力，为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服务型制造注入活力。

（据《经济日报》作者系重庆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